

莫山洪
—
著

骈文学史论稿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IANWENXUESHI

LUNGAO

骈文学史论稿

莫山洪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骈文学史论稿 / 莫山洪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495-9935-6

I. ①骈… II. ①莫… III. ①骈文—文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51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0 字数：220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骈文研究文献集成》（15ZDB068）资助成果

广西特聘专家岗专项经费资助成果

漓江学者团队专项经费资助成果



莫山洪，1969年生，广西忻城县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骈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理事。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骈散的对立与互融》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骈文学史及唐宋文学。

序

骈文之体,与中国古代文学相伴而行。骈文学之兴,自刘勰《丽辞》以后渐起,历代之选本总集、四六话或专论均呈现骈文学术之演进。而作为现代学术之研究,则自民国后方兴盛。骈文学史之研究乃探寻对骈文认识观念之演进,甚有意义。山洪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术业专攻,勤奋治学,收获颇多,本书即是有关骈文学术史之探索总结。读此书,可了解骈文史之历程,亦可知骈文学术思想之发展。

山洪君自本科时代即有志于学术,毕业后在高校任教,与我一起做骈文研究,虽处条件艰苦之地,然孜孜以求,不断有论文发表。后又跟随刘学锴、余恕诚先生攻博深造,学业精进,博士论文《骈散的对立与互融》出版后,在学界影响甚大。今山洪君将有关骈文学史的研究整理为专著《骈文学史论稿》,必将泽被学界。

是为序。

莫道才

2017年6月16日

目 录

- 1 导论 骈文理论的历史演进

- 18 第一章 草创时期的六朝骈文学
 - 18 第一节 六朝骈文学的发展
 - 30 第二节 萧子显的骈文观
 - 43 第三节 《文心雕龙·丽辞》与骈文理论

- 58 第二章 粗具规模的唐代骈文学
 - 58 第一节 隋及初唐反骈观念的形成
 - 70 第二节 中唐骈散相争及其美学价值
 - 87 第三节 四六的定名:从柳宗元到李商隐

- 99 第三章 四六时代的宋代骈文学
 - 99 第一节 宋诗话对四六话之影响
 - 111 第二节 宋四六话的兴起与骈文理论的演进
 - 123 第三节 《诚斋诗话》中的四六话

139	第四章	日臻完善的清代骈文学
139	第一节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与清代中叶的骈文文体意识
154	第二节	《宋四六话》的体制特点及学术价值
161	第三节	孙梅的《四六丛话》及其骈散融合理论
171	第四节	乾嘉时期的骈散相争下阮元的骈文理论
187	第五节	壮族文人郑献甫的骈文理论
200	第五章	现代转型时期的民国骈文学
200	第一节	民国骈文研究兴盛的原因
209	第二节	高步瀛不拘骈散的文章观
219	第三节	钱氏父子的骈文流变观
233	第四节	骈文作法研究的兴盛
243	第六章	亟待突破的当代骈文学
243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骈文选本研究
251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的骈文研究
260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的骈文研究
267	第四节	跨世纪的骈文研究
283	余论	反骈的历史嬗变
295	参考文献	
308	后记	

导论 骈文理论的历史演进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殊的文体,骈文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富于变化的历程。伴随着骈文的发展,中国骈文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可分为汉魏六朝的萌芽期、隋唐五代的骈散相争期、宋代的兴起发展期、清代的形成期以及清末民初的兴盛期这么几个阶段,即使到了新中国,骈文理论也依然在发展,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地方。

一、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残丛小语式的理论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发展时期,文学理论上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等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在骈文理论上,也出现了一些萌芽形态,主要集中在一些文学理论著作的片段中,具有残丛小语的特点,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理论的萌芽时期。由于骈文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一代之文学,为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而骈文理论也开始了它的历程。这一时期的骈文理论主要体现在这几

个方面：一是对骈文产生的探讨；二是对骈文历史的追溯；三是对骈文价值的评定；四是骈文选本的出现。

首先是对骈文产生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①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法则，那就是成双成对的事物占了很大的比重。作为反映生活的文学必然对此有所反映：“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②早在上古时期，中国语言文字中就已经存在了对偶的句式。由于语言的发展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书写工具也比较原始，人们的交流主要靠口耳相传，对句这样的形式比较适合于人们的记诵与传唱。后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也说：“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③

六朝时期的人们还对骈文的形式美问题进行了一番探索。当时的文人已经注意到骈文形式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即外在形式的华美。葛洪在《抱朴子·钧世》中指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④，认为文学讲究雕饰之美乃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客观反映。文学自其产生到魏晋南北朝，确实在形式上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随着语言艺术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在句式的字数、修辞、词汇等方面上都有了新的创新。汉代大赋的出现，就是一种文学趋向华丽的表现。六朝时期，这种华丽的倾向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以徐陵、庾信为代表。但是任何事物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88 页。

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88 页。

③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5 页。

④ 葛洪《抱朴子·均世》，四部丛刊初编本。

的发展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超过了事物发展的度，就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因此，当六朝骈文极度发展的同时，也就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明确指出，“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①，文学作品并不是以形式为最重要的，“兴”、“志”才是重要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礼义”。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今之文章”是“雕藻浮艳”^②，萧纲《与湘东王》书中对“京师文体”作了这样的描述：“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③他们都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待文学，因此，对文学的创作就提出了一个方向性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六朝人又强调了情的重要性。萧绎《金楼子·立言》说：“至如文者，惟须……情灵摇荡。”^④萧统《文选序》也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⑤。“情”成了评价文章的标准。如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⑥，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⑦，要求情的抒发要符合一定的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262 页。

②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北京：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907 页。

③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011 页。

④ 萧绎《金楼子·立言》，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⑤ 萧统《文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⑥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064 页。

⑦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312 页。

标准,要有一个“发乎情,止乎礼”的度。这与儒家的经典提法是非常相似的,孔子就曾经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大序》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六朝一部分文人对当时极度兴盛的骈文还是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与当时骈文的兴盛相比,声音无疑小了许多。不过,这对后世反对骈文倒是起了很大的理论准备作用。

在六朝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选本,即萧统的《文选》。这部著作虽然是一部各类文体作品的选本,包括诗歌辞赋,但其中的文则基本上是骈体的,因而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六朝骈文兴盛的状况。

处在萌芽时期的骈文理论,虽然说涉及骈文的许多方面,但是,六朝的骈文理论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这些理论还不是专门讨论骈文的,许多是评论家对整个文学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都是散见在各种文本之中,颇有一种残丛小语的味道。

二、反复期:隋唐五代的骈散相争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骈文与古文的发展都受到了诗歌的冲击。虽然说在文坛上也出现过初唐四杰和燕许大手笔、陆贽以及晚唐三十六体等骈文的兴盛时代,也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但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光芒却压住了所有其他文体。但这并不是说唐代文学理论就没有成就。

隋唐五代的骈文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骈文的批评上,说是骈散相争,其实倒是批判的多,争的成分相对少了一些。整个唐代,听到的几乎都是批判的声音——尽管许多人都在作骈文。一直到晚唐时期,李商隐才出来对骈文作了新的阐释。从初唐到晚唐,刚好是一个反复。

在隋及初唐,继承六朝以来的反对骈文形式华美与内容空泛的观念就已经形成了。首先是对骈文形式美的批评。隋朝李谔说六朝文学是“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过分追求形式,可谓一无是处。其后,魏征对六朝文学的形式美问题也给予猛烈地批评,“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②,“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③,他把六朝那种重文采、追求形式美的风格称为“亡国之音”。到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时代,王勃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六朝骈文作了这样的评价:“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④

当然,对于骈文这样一种文体,唐代的批评家不仅仅是从形式上给予了否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儒家观念出发,对六朝的骈文在思想情感上的倾向性进行了猛烈地批判。王勃说:“文章之道,自古称

① 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35页。

② 魏征《〈群书治要〉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0页。

④ 王勃著,蒋清翔注《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①陈子昂也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②说的虽是诗，但用在文上，也毫不为过。

而真正对六朝文风给予巨大打击的，应该说是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他们继承了自六朝以来历经隋代及初盛唐的反骈观念，明确地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思想。柳宗元批评骈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③，说自己是“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④。韩愈则认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⑤，“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⑥，“愈之为古文，岂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⑦。虽然说韩愈、柳宗元的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隋代王通以来的儒家所谓“贯道”、“济义”的文论观，但韩愈、柳宗元依然将骈文作为抨击的目标，他们把学古文当作是学古道的工具。为了宣扬古文，他们把六朝以来的骈文作为批判的对象。所以柳宗元说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

① 王勃著，蒋清翔注《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9 页。

② 周祖谟《隋唐五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0 页。

③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北京：中国书店 1991 年据世界书局 1935 年版影印，第 214 页。

④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北京：中国书店 1991 年据世界书局 1935 年版影印，第 359 页。

⑤ 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 1991 年据世界书局 1935 年版影印，第 219 页。

⑥ 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 1991 年据世界书局 1935 年版影印，第 248 页。

⑦ 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 1991 年据世界书局 1935 年版影印，第 311 页。

抽黄对白,唳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①。韩愈在对他所提到的各个时期的文学中,多数都予以肯定,唯有六朝,“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驰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②,他们反对骈文,仍然是对六朝以来骈文的两大方面不满:一是内容空洞无物;二是形式的桎梏,归根结底则是骈文缺乏政教作用。

但是,当文学发展到晚唐,李商隐的骈文创作又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对骈文也作了新的界定。李商隐在其文集的序言中说:“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③“因愚索其素所有,会前四六置京师不可取者,乃强联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时以类,亦为二十编,名之曰《四六乙》。”^④由此,骈文终于在此前毫无专名的基础上,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称。在此之前,骈文或被称为“今文”,或被称为“时文”,但都不是其应有的名称。

三、兴起发展期:宋代评点式四六话形式的形成和骈文理论专著的出现

如果说唐代还是一个情感胜于理智的时代,则宋代刚好倒过来,

①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据世界书局1935年版影印,第214页。

② 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据世界书局1935年版影印,第227页。

③ 刘学楷、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13页。

④ 刘学楷、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77页。

人们更多了一些理性。在这一时代,出现了文学理论兴盛的局面。对于骈文理论来说,四六话的出现无疑是骈文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演进。

宋代的骈文理论的成就,一是在骈文的作法理论上;一是在骈文史上。既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析,也包括对文学现象的描述。把这一时期的骈文理论称为兴起发展期,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的骈文理论著作,如王铨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同时,在许多诗话、随笔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四六话,如洪迈的《容斋随笔》、杨万里的《诚斋诗话》等。

首先是骈文作法上的理论,包括字句、声韵、用典、对仗等方面的理论。四六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在李商隐提出后,成了宋代文人普遍认可的一个名称。但他们有人认为四六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皆诗赋之苗裔也”^①,因此,有诗话自然就应该有四六话。在宋代的四六话中,对于骈文的作法讨论较多,如“文章有彼此相资之事,有彼此相须之对,有彼此相须而曾不及当时事,此所以助发意思也”^②,“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语以见工耳”^③,“四六全在编类古语”^④,这些是对骈文用典隶事方面作的描述。宋人喜欢对前人作总结,往往以“四六有用古人”如何如何为开头,如杨万里说:“四六用古人语,有用其一字之声,而不用其字之形者。”^⑤对于四六的语

① 王铨《四六话》,宋咸淳百川学海本。

② 王铨《四六话》,宋咸淳百川学海本。

③ 王铨《四六话》,宋咸淳百川学海本。

④ 谢伋《四六谈麈》,宋咸淳百川学海本。

⑤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2页。

言,他们也作出了一些论述。杨万里说:“四六有作流丽语者,亦须典而不浮。”^①骈文在六朝兴盛以来,其语言的华丽,形式的华美,一直被看作是应该给予严厉批评的。在杨万里的理论主张中,他对于四六语言的华丽问题并不是完全否定的,而是有针对性地去看待。如他说“四六有作华润语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②。对于文学来说,语言毕竟只是外在的东西,是表达意义的外在工具。王铨说:“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③其实这一段话应该说对于任何文体都是适用的;尤其是“贵出新意”,这可以说是文学作品生存的基础。

宋代的四六话,对骈文史也作了一些描述。这些描述主要是针对他们所谓的“四六”这样一种特定时期的文体。对于六朝的骈文,论者不多——毕竟,六朝骈文是被批判的骈文,是“亡国之音”——他们主要讨论的是“本朝”四六发展史及四六作家。王铨《四六话》说:“先公言本朝自杨刘四六弥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气。”^④对于宋代四六文的兴盛,当时人完全不避讳。杨万里《诚斋诗话》说:“本朝制诰表启用四六,自熙丰至今,此文愈甚。”^⑤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谈到:“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

①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3页。

②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3页。

③ 王铨《四六话》,宋咸淳百川学海本。

④ 王铨《四六话》,宋咸淳百川学海本。

⑤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页。